

徽商与戏剧的发展

文/王世华

摘要：戏剧是一种纯艺术活动，但它的存在是要由经济来支撑的，没有经济就谈不上艺术。明清时期，富甲一方又有文化的徽商，对戏剧情有独钟。正是由于得到徽商的支持，徽剧才得以生存，得以发展，得以提高，得以创新，最后诞生了国剧——京剧。

关键词：徽商；戏剧；徽剧；京剧

中图分类号：J809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6-0138(2010)05-0085-02

经商与唱戏，一个忙挣钱，一个搞艺术，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，但徽商与戏剧却有着不解之缘。徽商为戏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、成长的舞台、提高的动力、创新的机会，戏剧给徽商提供了精神的享受、带来了虚荣的满足、架设了和官员沟通的桥梁。

一

戏剧是一种纯艺术活动，但它的存在是要由经济来支撑的，没有经济就谈不上艺术。你要唱戏，就得有人管饭。戏子是可以唱《空城计》的，但肚子可不能唱“空城计”。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。明清时期徽商恰恰就是给戏子“管饭”的老板，从而为戏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。致富的徽商为了追求精神享受，首先大造园林。扬州是徽州盐商的大本营，巨商大贾拥资百万、千万，为了享受，纷纷建造园林，因此，与其他各地相比，“以园林胜”成了扬州的一大特色。像清代徽商马曰琯的“小玲珑山馆”，素有“街南书屋十二景”之称。俗有“四元宝”之称的徽商黄氏四兄弟——黄履晨、黄履暹、黄履炅、黄履昂等，以盐致富，在扬州建有易园、十间房花园、容园、别圃等。歙商汪氏建别墅曰南园，内有“深柳读者堂”、“谷雨轩”、“风漪阁”诸胜。歙商徐赞侯家南河下街，有“晴庄”、“墨耕学圃”、“交翠林”诸胜。大盐商江春的“康山草堂”、“随月读书楼”等更是著名园林。清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中所记载的扬州园

林大部分都与徽商有关。尤其是康熙、乾隆下江南，每次到扬州，徽州盐商为了邀宠，将园林一次次美化，甚至赶造新的园林。正如《水窗春呓》所载：“扬州园林之盛，甲于天下。乾隆六次南巡，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，计自北门直抵平山，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，无一处是重复。”

再好再大的园林如果仅仅供自己消遣，迟早也会感到乏味和无聊的。所以，徽商这些“园主”们就经常邀请文人学者来此聚会，吟诗作画，你唱我和；有的学者甚至在此居住，读书治学。当然更重要的是凭借自家的园林演戏，广邀当地官员、名士前来观看。这才是气派呢！徽商虽没有学过公共关系学，但运用起公关策略来却是“九段高手”。这也难怪徽商，在那个“官本位”的社会，一切权力、一切资源都攥在官员手中，你要想获得经营特权，或保住自己的利益，不求官员行吗？送礼固然是一方面，但除了物质的东西外，总要有精神、文化的东西吧。那时不像现在，剧团、剧院各地都有，看戏听歌，小菜一碟，好莱坞大片也毫不足奇。甚至国家大剧院里世界名星演出，也是认票不认人的。那时哪有这些文化娱乐，没有剧团，更无像样的剧院，所以，请官看戏，对官员来说可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享受，对徽商来说就是一种高级的精神贿赂了。

徽商深知戏剧的特殊作用，所以纷纷蓄养起很多“家班”，也即家庭

戏班，以便随时演出。蓄养一个“家班”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仅仅“管饭”就行的。要有创作，要有导演，还要配服装、道具，天天排练，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开支。据孙静庵《栖霞阁野乘》卷上载：“最奇者，春台、德音两戏班，仅供商人宴，而岁需三万金。”3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？可以买3万石优质白米，也可以买1200亩良田啊！一年要花3万两银子蓄养“家班”，除了徽商谁能负担得起？有了“家班”，自然就要演出，所以，每逢岁时节令，徽商就诚邀当地官员、名流宿儒前来看戏。在优雅的园林中，享受着高规格的待遇，观看很难看到的戏剧——当时主要是徽剧，你能不感谢徽商吗？能说徽商不好吗？只要这样，徽商的目的就达到了，他们与官员的关系就更密切了。而对演员戏子来说，面对这些高贵的观众，谁不愿意使出浑身解数，以一展歌喉、一施绝技呢！

这真是歪打正着。徽商蓄养“家班”，虽然要花费重金，原是半为自己享受，借机炫耀，半为拉拢达官贵人、名流学者，乘机献媚，但客观上却为戏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徽商为戏子提供了生存条件，戏子有吃有穿，自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中去而不致有后顾之忧。徽商又为戏子提供了实践舞台，不时的演出，而且面对高贵的观众，使得他们不断地切磋技艺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不敢懈怠的是戏子，敢于玩乐的是皇帝。康熙、乾隆时期，两位皇帝都曾先后六次南巡，必到的地方是扬州，迎驾少不了的是徽商。徽商（主要是盐商）不但要承担巨额的迎驾费用，而且还要组织唱戏以娱天子。关于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的盛况，《清稗类钞·巡行类》这样描述：“高宗第五次南巡时，御舟将至镇江，相距十

余里，望岸上著大桃一枚，硕大无朋，颜色红翠可爱。御舟将近，忽烟火大发，光焰四射，蛇掣霞腾，几眩人目。俄顷之间，桃砵然开裂，则桃内剧场中峙，上有数百人，方演寿山福海新戏。”又载：“南巡时须演新剧，而时已匆促，乃延名流数十辈，使撰《雷峰塔传奇》，然又恐伶人之不习也，乃即用旧曲腔拍，以取唱演之便利，若歌者偶忘曲文，亦可因依旧曲，含混歌之，不至与笛板相违。当御舟开行时，二舟前导，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，向御舟演唱，高宗辄顾而乐之。”皇帝高兴了，徽商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。据史籍记载，在迎驾时节，扬州戏曲演出极其兴盛；即使平时城里城外的“堂戏”、“台戏”、“大班”等各种演出也频繁不断。

当然“家班”也并非谁有钱想养就能养的，因为戏子不是人人想做就能做的，是非要有一定技艺的人不可的。因此，有幸蓄养“家班”的徽商可以想看就看，而那些无缘“家班”的徽商尽管财大气粗，也只能插空延请戏子来家演出了。江苏淮安的大盐商汪氏侨此营商已两百余年，家富百万。但他家就没有“家班”，要看戏只好到外地请。清代中叶，每年端午节以后，天气渐热，苏州的名优就开始停演了，谓之歇夏。于是汪氏就乘此机会用重金延请名优。毕竟炎热敌不过白银，在雪花银子面前，戏子也就翩然而来。汪氏一直把他们留到八月中秋以后才回去。这期间可不得了，据徐珂《清稗类钞·豪侈类》载：“此数十日午后，辄布氍毹于广厦中，疏帘清簟，茶瓜四列，座皆不速之客，歌声绕梁，笙簧迭奏，不啻神仙之境也。”在这“歌声绕梁，笙簧迭奏”的“神仙之境”，徽商是享乐了，他们哪里想到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演出中，演员的技艺也在无形中提高了。

二

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”精于此道的徽商竟别出心裁在演戏上也来个“货比货”，组织两个戏班唱“对台戏”。下面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：明代南京城内有不少戏班，但最著名的是两个：兴化部和华林部。一日某徽商忽发奇想，用重金请来两个部，在自家园林里搭建相邻的两个舞台，一在东，一在西。为了营造气氛，徽商

遍邀金陵贵客，那些达官显贵、妖姬静女，莫不毕集。当时列兴化部在东边舞台，列华林部在西边舞台，皆唱抨击奸相严嵩的《鸣凤记》。开场伊始，引商刻羽，抗坠疾徐，可谓不相上下，台下观众一片叫好。谁知演到严嵩出场时，情况突变。西边舞台扮严嵩的是李伶，东边舞台扮严嵩的是马伶。举手投足、侃侃而谈之间，高下立分。坐客渐渐移到西边，看到精彩处，甚至大呼命酒，高声喝彩，而东边只有寥寥数人了。很快东边就嘎然而止了。原来马伶演不下去，已易衣开溜了。

其实，马伶在金陵也是有名的戏子。他这一走，兴化部群龙无首，又不肯另拜他人，只好停演，华林部就独擅金陵梨园了。谁知三年后马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，而且又找到当初的那位徽商，请求再演一次“对台戏”。徽商慨然应允。仍然是上次的戏台，仍然是上次的观众，仍然是上次的剧目——《鸣凤记》。但这次可不比上次，待到马伶出场，举手投足、侃侃而谈时，活脱脱的一个严嵩再世，台下一片喝彩。东边的李伶知道不妙，立马停演，匍匐在马伶面前，口称弟子了。

马伶又从哪里学得这一身绝技呢？原来上次扮演严嵩，他输就输在从来没有和官员打过交道，更别提当朝一品宰相了，所以，举手投足之间，与朝廷高官相差甚远，自然一败涂地。为了能够观摩朝廷高官的日常举止，他竟然一路到了北京，打听到当朝宰相是昆山顾秉谦，于是想方设法，托身为相国家的门卒，而且一干就是三年。三年期间他“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，察其举止，聆其语言，久乃得之”。作为戏子，能够“深入生活”到了这种地步，还有什么学不像的呢？所以，他重返舞台时，自然将严嵩演得维妙维肖了。

徽商组织“对台戏”，本意是为了取乐，不想却刺激了某些演员，使他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，从而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与提高，尽管这是歪打正着。

三

清代皇帝个个是戏迷，尤以乾隆为甚。这位“十全老人”虽经常征调戏班到宫中演出却仍不过瘾，还要不

远千里六次到扬州看戏，在徽商的调教下，扬州戏班给这位老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是“十全老人”八十大寿，这是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，不用说，宫里宫外忙得不亦乐乎！地方上最会凑热闹的恐怕就数扬州了，因为扬州最富，戏班最多，皇帝最喜欢。扬州主要靠盐商，盐商主要是徽商，徽商深知这正是向皇帝献媚的好时机，哪能袖手旁观呢？所以，在盐运司官员的授意下，总商徽州人江春立即以重金组建艺术精湛的戏班——三庆班进宫演出，为皇帝祝寿。三庆班以“二黄耆宿”高朗亭为首，江春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三庆班这一去，却开辟了我国戏剧的新纪元。

三庆班进京一炮打响。不仅在皇宫演出风头独健，在民间演出也名声大著。那时戏曲分花部、雅部，雅部指昆腔，花部指昆腔外的地方声腔，而徽班不但善演花部诸戏，而且对雅部也很熟悉。徽班所具独擅两部的特长使得其他戏班不甘拜下风。三庆班在北京立足后，又有四喜、启秀、霓翠、和春、春台等安徽戏班相继进京。在演出过程中，六个戏班逐渐合并为三庆、四喜、和春、春台“四大徽班”。当时戏庄演戏必用徽班，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、广和楼、庆乐园、三庆园必以徽班为主。据《清稗类钞·优伶类》载：“嘉庆以还，京师苏班日就衰微，徽班乃遂铮铮于时。班中上流，大抵徽人居十之七，鄂人间有，不及徽人之多也。其初入都，皆操土语，侨居数代，变而为京音，与土著无异。伶界最重门阀，而徽、鄂人后裔之流寓在京者，大抵均世其业，称为世家，诸家姻娅相连，所居皆在正阳门外五道庙一带。”

徽班在演唱二簧、昆曲、梆子、啰啰诸腔的基础上，又兼容并蓄，吸收北京曾经流行的京腔（高腔）、秦腔中的长处，逐渐演变成京剧——中国的国剧也就呱呱坠地了。当我们今天大谈振兴国剧的时候，是不应忘记徽商的这些贡献的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世华，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（独立学院）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，芜湖市，241008。

责任编辑 俞景华